

社会学视角下的金融研究： 发展脉络与主要议题^{*}

杨典 欧阳璇宇

(摘要)金融社会学近年来成为一个迅速发展的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化不断加深及金融资本主义日益崛起的历史进程。金融化并不限于经济领域,而是一个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全面扩张的过程,导致整个社会生活出现金融化趋势,并影响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议题和取向,也为金融社会学的兴起提供了强大经验基础和理论依据。本文追溯、分析金融社会学产生、发展的经验基础和历史脉络,梳理、总结金融社会学在理论和经验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和进展,并结合中国独特的金融体制、丰富的金融实践提出了未来值得关注的重点方向和主要议题。

关键词:金融化 金融资本主义 金融社会学

JEL分类号:A12 A14 Z13

近年来,社会学对金融现象的研究即金融社会学成为一个迅速发展的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金融化不断加深及金融资本主义日益崛起的历史进程。金融化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导致整个社会生活出现全面金融化的趋势,并影响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甚至文化研究等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议题和取向,也为金融社会学的兴起提供了强大经验基础和理论依据。

一、金融化和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

爱泼斯坦(Epstein, 2005)将金融化定义为“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参与者和金融机构在国内和国际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日趋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进程及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各个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快速增长,经济金融化趋势不断加强,国家、企业、家庭和个人的活动愈发被金融活动所影响。金融资本的全球流动是当前资本主义发展到新阶段的突出表现,它改变了以往的资本结构和产业结构,极大地强化了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支配作用,带来“社会生活金融化”的新趋势。金融产品的类型和规模大量扩张,金融资本运作更加灵活,金融资本的符号化和虚拟化程度进一步提升,这也使得金融市场呈现出不稳定性和高风险性,局部市场的危机很可能导致全球经济动荡;金融资本的主导作用在当前高度全球化的条件下已超出单一的市场领域,并深刻影响着国家治理模式、公司治理结构与战略规划、家庭投资理念和个人日常思维。可以说,金融化已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而是整个社会的全

^{*} 杨典,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社会学博士。欧阳璇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股票市场稳定发展的社会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16BSH075)的阶段成果。

面金融化，是金融资本对全球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形塑及重构，标志着一种资本主义新形态——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相比于工业资本主义导致的“大转型”（波兰尼 2017），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堪称影响更为深远的“第二次大转型”（杨典和欧阳璇宇 2018）。

关于金融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目前学术界并无定论，但存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主要是代理理论）和社会学/组织理论这两大阵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认为以“股东价值最大化”（the maximization of shareholder value）为导向的公司治理模式能有效地降低代理成本、最大化股东收益，最终有助于公司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实现最佳效率；而社会学/组织理论则认为，“效率”和“理性”本身是社会建构的结果，“股东价值”神话的创造和传播是市场中拥有权力的并购专家、机构投资者和证券分析师所大力推动的，大量美国公司是出于组织合法性的考虑才采用了与股东价值最大化理念相匹配的公司制度和治理结构，从而使得美式股东资本主义（American Shareholder Capitalism）快速扩散。而美式股东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就是以金融市场为中心，金融市场能够对主导全球经济活动的跨国公司的治理和战略产生很大影响。这大大提高了金融市场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金融市场也因此获得了影响企业运营、产业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力量。此外，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有效市场假说的提出、便于大规模企业兼并重组的新金融工具的出现、美国机构投资者的壮大以及信息技术革命与全球化的多因素叠加都助推了金融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崛起。

二、传统金融理论的困境

当前金融资本主义的影响已经大大超出了经济领域，促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结构整体性、全方位的大转型，推动了政府、企业、家庭和个人的全面金融化。正因如此，西方金融理论的适用性和有效性遭到了不小的挑战。具体来看，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现代金融学^①的主要理论预设是金融活动中参与者的完全理性、完全市场（perfect market，又称“完美市场”）和无套利均衡，并发展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CAPM）和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s Hypothesis，EMH）两大理论支柱。而实际的金融活动与现代金融学中的理论模型仍存在差异的：一方面市场并非完美，另一方面市场参与者也难以具备完全理性，至多只能进行有限套利（吴晓求 2014）。

当然，对任何理论的评价和批评都应该考虑这些理论的发展，不能一味地指责其最初的假定（李培林 2001）。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面对现代金融学不能解释的诸多“未解之谜”（张圣平等 2003），行为金融学和制度金融学进行了各自的探索。行为金融学对金融市场的研究更紧密地联系现实世界，加入了心理认知、行为分析等心理学、社会学研究方法，注意到个人非理性行为和“羊群效应”等社会心理因素的存在，注意到金融市场中参与者的有限理性和个体认知对金融活动的影响（饶育蕾和张轮 2005），推动现代金融学从纯数理模型基础上的资产定价分析走向基于有限理性的金融资产预期定价（汪丁丁 2010）。制度金融学则试图揭开现代金融学理论曾忽视的“制度黑箱”，认为金融产品的同质性和充分多样性并非“外生”，而是基于一系列金融交易和金融制度变迁可能达到的“内生”结果，现代金融理论所假设的交易成本为零的金融境界也是人们有意进行金融制度创新的结果（张杰 2011）；也就是说，法律制度、政治结构、监管体系以及文化传统等种种制度因素能够影响金融活动，且这些制度并非既定的，而是处在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中。

但来自行为金融学和制度金融学的挑战更多是对现代金融理论的补充和修正，尚不能撼动主

^① 又称新古典金融学、主流金融学、标准金融学或现代经典金融学，以行为金融学、制度金融学为代表的金融理论的新发展也可统称为新兴金融学或新金融经济学。

流理论在资本资产定价、金融市场运行和金融风险防控等分析中的基础性地位,更未形成一套成熟的理论体系。

综而述之,现代金融学给金融参与者提供了一种理论意义上“理性”、“效率”的分析手段,使得行动者试图通过对资产的理性经营获得经济和生活的自由,但这些所谓的“理性”和“效率”不是自然生成的客观规律,而往往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比如,代表着“最佳效率”的“股东价值至上”公司治理模式在全球的扩散很大程度上是经济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金融市场通过全球市场网络推动的,并进一步影响到政府、企业、家庭和个人等所有的经济活动主体,从而改变了相关制度安排与思想观念,这就意味着社会中的权力、观念认知、制度和关系网络都会影响到实际的金融体系运转和投资者行为。这些外部事件与市场变动的关系是非直接、非线性、不可预测的,现实中金融市场的运作会受到社会—文化背景、价值规范、群体行为和政治权力等一系列复杂社会因素的影响,也正是这些社会动态特性的存在,社会学的分析得以用来弥补经济学假设和价格波动模型方面的不足(周长城和殷燕敏,1999)。

三、金融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脉络

在上述理论和现实需要的双重驱动下,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学界对金融领域的关注和研究越来越多,金融社会学逐渐成为独立的社会学分支学科并获得快速发展。

目前,虽然社会学界还没有形成一些比较精准完备地分析金融现象的理论范式,但早在社会学经典理论创立之初,韦伯(Max Weber)等著名社会学家就已对证券、期货等市场进行过考察研究并提出过诸多至今仍有价值的观点。韦伯通过《证券交易 I:目的和组织结构》等著作对一系列关于金融市场的历史、组织结构、形成过程、法律与道德规范、合法性等问题进行了论述(杨义凤,2012)。韦伯认为,证券交易不是为了欺骗诚实劳动者而组织的阴谋家俱乐部(conspirators' club),而是在商品种类增加、交易范围扩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证券交易不再以满足个人和家庭消费为目的,而是通过套利(与地点相关的价格差异)和投机(与时间相关的价格差异)追求利润(Weber,2000)。这些论断直接确证了证券交易在当时的合法性,更新了部分社会群体对资本主义发展和交易模式变革的认知,也助推金融现象进入社会学研究的视野。此外,韦伯还探讨了证券交易过程中交易模式的发展、从业人员经验的积累、证券交易在民族国家经济竞争中的政治角色与权力手段(Weber,2000)。结合韦伯后期对市场的论述可以看出,作为经济行动的一种,证券交易市场与其他市场的本质是一样的——同样以其他参与竞争者的行为(或想象竞争者的行为)为取向,因而都可以成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金融化趋势日益显现,西方社会学界借用经济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范式对金融现象进行了大量研究。美国社会学家贝克(Wayne Baker)对“国家证券市场的研究”被视为新经济社会学研究金融市场的开山之作,他通过对证券市场进行市场网络分析,提出一个国家的证券市场是由证券交易市场上的主要行动者网络所构成的社会结构,交易者之间所构成的微观和宏观网络结构最终会影响整个证券市场交易价格的变动(Baker,1984;陈旻,2011)。随着美国金融管制进一步放松和全球跨国经济活动迅速增加,特别是美国商业银行经营业务限制的逐步放开,学者对美国银行业监管的变革、金融市场对商业银行的挑战、跨国银行的合作与美国银行的全球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斯梅尔瑟和斯威德伯格,2009)。当然,金融自由化和直接融资市场的崛起也加快了“金融脱媒”,银行系统对企业的约束力减弱,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和“有效市场假说”等理论思潮的推动下,公司治理和运作由“经理人资本主义”(managerial capitalism)模式向“股东资本主义”(shareholder capitalism)模式转变,企业高管的薪酬和经营行为受到金融市场和股东的约

束(Fama, 1970; Stearn, 1986; Fligstein, 1990)。因而学者关于金融市场中机构投资者、风险投资以及股票市场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例如: 在机构投资者方面, 学者研究了机构投资者的兴起及对公司治理、公司发展战略的影响(Davis et al., 1994; Davis and Thompson, 1994; 尤辛, 1999); 在股票市场方面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有效市场理论”与投资行为和公司行为的关系(Brealey et al., 2001)、金融投机所引发的社会影响及社会学思考(Davis and Thompson, 1994; 弗雷格斯坦, 2008); 另外, 在全球化浪潮下, 美国以外的金融市场以及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也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斯梅尔瑟和斯威德伯格, 2009)。

进入 21 世纪后, 西方金融社会学的发展得以提速, 形成了不少有影响力的经验研究和具有学科史意义的理论文章, 并编撰出版了金融社会学著作, 呈现了当代金融市场的结构与历史发展。

2005 年塞蒂娜和普瑞达(Cetina and Preda, 2005) 主编的《金融市场社会学》(*Sociology of Financial Markets*) 一书问世, 对社会学开创系统性的金融市场研究起到了奠基性、指引性的作用, 标志着金融社会学发展的新阶段。塞蒂娜和普瑞达认为, 在当前西方社会, 金融活动已不仅仅是单一的公司经济活动, 同样也涉及政治、社会福利、社会保险体系以及大众文化等诸多方面。总体来说, 社会学对金融领域的研究更多将金融活动置于整个社会中并结合政治、文化、社会等因素来进行考察, 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现代社会的结构、发展动力以及人类行为的根本层面(Preda, 2007)。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刺激了社会学界对金融领域的兴趣并强化了这一议题的重要性。卡拉瑟斯及其学生发表的《金融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Finance*) 一文探讨了金融系统的发展与影响, 并指出了与金融相关的诸如社会不平等、非正式部门、社会网络等未来可以研究的领域(Carruthers and Kim, 2011)。他们研究了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后的金融系统, 揭示出在金融市场发展进程中政治因素的重要性、对公司治理的各种影响、社会因素持续不断的作用以及金融理论和金融工具对金融实践的形塑作用。构成上述变化的基础是资本作为媒介机制的转型, 资本通过证券化等机制从金融机构(financial institutions) 转向金融市场(financial markets), 并与金融理论、技术和意识形态相结合, 共同造就了足以改变社会制度的“金融化”这一强大力量。在此视角下, 西方社会学者全面回顾了美国以及世界经济金融化的原因和后果, 尤其在两个方面关注了金融市场的社会扩张: 一是股东价值导向指引公司战略和公司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 促使业务外包和公司拆分、解体, 同时提高了企业高管的薪酬水平; 二是金融化已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塑造了社会不平等、文化和社会变迁的模式(Davis and Kim, 2015)。

除经验类文章外, 以《金融市场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Financial Markets*)、《牛津金融社会学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Finance*) 为代表的金融社会学著作较为全面地集结了社会学者在金融制度、金融市场运行与治理、金融中介机构、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等方面的分析(Cetina and Preda, 2005, 2012), 对于指引社会学的金融研究、扩展金融学研究的视野提供了系统专业的参考。

总的来看, 近年来金融社会学蓬勃发展、影响力越来越大, 不仅经济社会学家关注, 政治社会学、社会分层、文化社会学等众多社会学分支学科学者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例如, 英国学术期刊《理论、文化与社会》(*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推出的“金融化之后的精英和权力”(Elites and Power after Financialization) 专题文章, 在分析精英研究原有不足和当前资本主义金融化阶段对精英研究的影响的基础上, 就“新国家-资本关系”(new state-capital relations)、“(金融) 价值获取的创新性形式”(innovative forms of value extraction)、“流动时代的新型精英不安全感与资源”(new elite insecurities and resources in liquid times)、“中介型精英与专家型精英的(社会) 角色”(the role of elite intermediaries and experts) 四个关键研究主题进行了探讨(Davis and Williams, 2017)。又如, 2017 年美国社会学年会的主线即是探讨金融化/金融资本主义对社会分配和社会认同的影响。在

此次会议上,无论是大会开幕式上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教授、美国哲学学会主席等其他学科嘉宾的主旨发言,还是社会学界内部的分论坛,都有相当大比例的学者在探讨整个社会的金融化(不但是经济部门的金融化,还包括公共部门/政府部门、家庭的金融化)对社会不平等、贫困、社会包容、社会团结的影响。这说明金融化/金融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社会影响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达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同时也反映出金融化等问题已重塑了美国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和发展方向。

四、金融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和经验议题

经济社会学研究表明,制度、权力、社会网络和认知(理念)深深塑造了经济行为。金融社会学作为经济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其主要理论视角也是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on theory)、权力分析(power analysis)、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和认知-文化路径(cognition-cultural approach)等经济社会学视角。虽然金融社会学家借助社会网络分析、社会建构论和民族志研究对金融问题做了诸多分析,但有学者指出,目前金融社会学的研究主要还是借助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资源所做的一种替代路向的研究,即针锋相对地给出与经济学不同的社会学解释(Swedberg, 2000; 王国伟, 2012),但金融社会学学科独特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研究路径还没有构建起来。

比较而言,社会学对金融问题的追问不同于经济学家、金融学家或投资者所关注的具体金融市场运行和金融投资等方面围绕“资产”、“技术”、“工具”的理论和操作研究,社会学家更倾向于将金融系统的内部运作置于特定的制度与组织框架和社会情境中去思考,并特别关注其对社会的长期影响(Cetina and Preda, 2012)。尽管社会学包含不同的理论流派和研究范式,但金融社会学作为当前一个新兴的分支学科完全可以采用社会学中不同研究路径对金融体系中多层次资本市场、金融机构、政府监管和群体行为进行研究,既能用宏观数据分析金融市场的历史结构变迁,也能用民族志方法探讨日常金融实践的文化意涵。此外,金融发展与国家能力、金融市场权力变化与公司治理模式变革、金融与产业政策调整、金融与社会分层和财富分配是金融社会学未来发展中应深入研究的议题。虽然金融化几乎涉及当代社会的所有方面,但金融社会学应重点关注经济金融化对社会文化观念、社会不平等、非市场领域和社会变迁等社会学的核心研究领域产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维度的影响(戴维斯和金孙泰, 2018)。

以文化观念、思维方式与金融行为为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产品的激增,美国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对金融的话语体系更加熟悉和适应,开始以清晰的金融术语来思考日常生活,并策略性地运用加杠杆的资产来维持他们的生活方式。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说,生活方式是与消费有关的文化意义和身份,金融文化影响了人们的财产管理和消费观念,人们更愿意承担金融风险,通过负债来追求或维持消费标准背后的生活方式和身份认同(Fligstein and Goldstein, 2015)。在盛行的“投资组合”理念下,金融投资产生的回报却并未用于企业的再生产,金融业这种“脱实向虚”的“自盈利”作法致使工薪阶层负债增加和实际工资增长停滞(Van der Zwan, 2014),看似有利于弱势借款人的次级贷款也产生了相反的效果(例如由次级房屋抵押贷款所引发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Carruthers and Kim, 2011)。在金融危机中,处于底层的家庭因为资产结构单一(主要是房产)而失去大部分财富,而处在财富分布顶层的富人能凭借更多元的资产组合迅速恢复资产损失,贫者愈贫、富者愈富(Fligstein, 2016)。金融化的影响在金融市场之外的非市场领域也被金融利益所渗透,地方预期财税、城市预期物业税收等诸多传统上不被视为金融资产的领域在金融思维的影响下都被过度证券化,这使得城市政治、行政决策与金融投资/投机紧密相连,造成复杂的经济社会后果

(Weber 2010; Pacewicz 2012); 另一方面, 金融市场的掠夺性股权采用资产证券化操作不断加快城市出租房屋的周转率和提高土地价格获取短期投资回报, 致使贫困城市人口和农业生产者生活、生产条件进一步恶化(Davis and Kim 2015)。不仅如此, 金融投资文化及其反对思潮还与更宏大的社会公共议题相联系, 成为社会变革中不可忽视的一环。例如, 过度金融化带来了“占领华尔街”、“反全球化”等激烈的集体抗议活动和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回潮; 同时, 利用金融工具推动社会运动和利用金融力量尝试温和改造现有的金融体系的社会运动也时刻在发生。

由上可见, 金融社会学不仅能在微观的个人借贷和企业融资领域展开分析, 也能扩展到国家治理、阶层结构、文化变迁等社会宏观结构领域。无论宏观、微观, 金融社会学试图理解: 认知、文化传统是通过何种角色驱动金融行为的, 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又是如何在金融行为中影响金融资本流动的; 更一般地, 制度和权力是如何通过具体的金融活动塑造和影响金融制度和金融行为的, 等等。

五、中国经验与金融社会学: 主要议题与重点方向

(一) 中国金融社会学的主要研究议题

中国的金融社会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未能形成具有金融社会学学科意识的研究范式, 但以金融为研究对象的经验研究已有不少, 既有政府金融治理、民间金融、企业融资、金融与社会关系等以中国金融实践为取向的经验研究, 也有直接回应当前全球经济金融化态势的宏观理论研究。

近年来, 民间金融的运作模式(张翔 2006) 及其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政府对民间融资治理的创新(向静林和张翔 2014) 等日益受到大众关注。中国独特的社会环境、市场经济发展阶段和社会关系传统在民间金融中的复杂互动呼唤学界对民间金融的研究进行创新, 推动从理论模型的建构扩展到行动者实践的全面理解, 分析蕴含于其中的国家、权力、社会资本、制度扭曲等因素(陈旻, 2014)。制度矛盾是中国金融交易中风险分担不确定的结构性根源, 虽然事前各参与主体一致同意风险自担, 但制度的矛盾赋予了投资者、地方政府、中介机构在事后风险分担问题上具有竞争性的利益驱动力和合法性理据, 形成摆动不定的局面(向静林等 2019)。在当前金融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势下, 政府引导推动体制外民营金融业改革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史晋川等, 1998), 但若在改革过程中政府政策多变、对产权保护力度不足则会使民营金融机构难以在经营活动中建立声誉机制, 反而只能依靠政府的支持作为信号吸引储户, 导致自身发展更依赖政府政策, 并不利于金融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张翔 2010)。在这种金融发展模式下, 政府也愈难退出市场经济纠纷、甚至导致信用危机。所以有学者指出, 中国总体性的政治层级体系影响了金融的政府管制方式, 致使中国金融市场体系不可避免地带有层级性和多重边界性, 这种体制虽有一定效率的组织 and 调节机制, 但其中也存在诸多隐患(王水雄 2014)。但另一方面, 在金融化过程中, 国家凭借一系列制度性和结构性安排, 也可以通过金融集权提升控制和动员资源的能力, 从而提升国家能力(刘长喜等 2020)。

实践层面的金融-社会关系也颇为重要, 甚至可以直接作用于宏观市场。社会学家通过分析微博数据发现, 在股市震荡期, “微博信心指数”与“上证指数”之间存在显著的长期正相关均衡关系, 这既反映出中国资本市场中大量中小散户和投资噪音的存在, 也表明社交平台上的网络舆情对经济政策和市场稳定具有重要影响(陈云松和严飞 2017)。而保险业中的实践也显示, 若将人际关系过度用于商业化, 将导致保险代理人深陷情感矛盾, 对代理人原有正常的社会网络和非商业性关系的建立产生消极影响, 工作与生活的模糊边际导致“情感异化”和心理污染(盛思鑫 2010)。在金融化趋势深度影响社会之际, 社会也演化出相应的自我保护举措, 但诸多尝试还未取得良好成效, 如加密货币等反抗金融化(避免金融资本对社会的剥削)的创新反而加剧了金融资本主义下的

投机行为,引发更为复杂的社会风险(吴肃然,2021)。

将视野扩展到全球,全球化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金融风险和结构性难题,过度扩张的信贷、杠杆和超前消费使得失业攀升、养老难题、政府债务危机、经济低增长成为常态(翟本瑞,2014)。随着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被誉为最佳公司治理模式的“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在全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是研究表明此种治理制度的扩散更多是出于外部制度环境的压力而非显著提升企业绩效后的理性选择,如何反思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美式“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杨典,2018)。金融资本在全球的深度扩张不仅影响企业活动,也引起社会的结构性变迁,逐渐形成“金融社会”这一新的社会形态(陈介玄等,2018;刘长喜,2020),同时还不断削弱政府自主性与经济权力、分化工人阶级并导致工会日益衰落,加速推动经济金融化向社会金融化演进;虽然金融逻辑和金融思维逐渐成为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的底层逻辑,但人们却发现“理性”的金融经营难以成为增进自由的手段(杨典和欧阳璇宇,2018;艾云和向静林,2021)。

(二) 未来值得关注的重点方向

作为近三四十年全球经济社会变迁中重要动态和趋势的金融化,学界和业界对其还存在诸多模糊认识,社会学本身以及相关交叉学科在金融化与社会结构、社会阶层分化、家庭债务以及文化与制度等议题上的研究还比较缺乏(梁光严,2021)。这就表明,未来的金融社会学研究一方面要注重继承和发展社会学经典理论中的概念与视角,另一方面则应在现有金融市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深化和创新,注重关切金融化的政治社会影响,同时积极引入多学科的综合分析视角,形成具有代表性的金融社会学理论与研究范式。

具体说来,未来至少有以下重要议题值得中国社会学界和相关学科深入研究。

一是金融与国家治理(国家安全、国家能力)。一个国家内部的经济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关键因素,也关系到该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经济政治利益和角色定位。在金融资本主义背景下,全球金融市场凭借着对跨国企业投资、产业发展的强大影响力不断削弱着民族国家的经济自主性,特别是欠发达国家往往被动成为金融资本青睐的全球价值链末端的廉价生产基地,中国如何在强势的全球金融市场面前保持战略定力事关国家金融体系稳定与整体国家安全。另一方面,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调整期和金融治理架构重构期,建立对本国有利的未来国际经济游戏规则,平衡经济发展中短期与中长期目标间的矛盾具有深远意义(高柏,2009)。历史上严重的金融危机都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危机、国家政策的重大转向、国家-社会权力关系的变革和社会结构与社会利益关系的失衡(张海东和李在烈,2009;刘春荣,2009;黄晓春,2009)。典型的事例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快速加杠杆所带来的风险就深刻体现了高杠杆率背后金融的脆弱性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复杂性影响(张晓晶,2021)。因此,应对金融风险 and 危机不但要优化经济发展方式,还要从金融社会学角度思考金融如何影响国家能力、社会结构调整、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等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家竞争力的重大问题。

二是金融化与地方治理、地方发展。金融部门在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有助于贯彻落实国家和地方的产业政策、提供公共服务和加强民生建设与社会治理。但部分地区在经济发展和城乡建设中的过度金融化累积了巨额债务,引发地方经济波动,导致地方政府财政困境和较高的金融风险,使得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受到掣肘,尤其在人情、关系等非正式规则盛行的县域和中小城市,过度依赖举债的发展模式和金融化将加剧城乡阶层固化和贫富分化,易形成不良利益集团、不健康的政商关系和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开启全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之际,创新金融服务在乡村振兴、城乡融合等方面的战略举措是满足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求的关键之一(胡滨和星焱,2021)。因此,化解地方金融风险、推动财税体制改革不仅是一项经

济金融课题,也是社会学议题,需从社会整体发展全局的角度出发,系统研究、处理好(金融)市场与政府、金融与社会、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三是金融化如何重塑公司治理与劳动就业。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企业界经历了大规模的兼并重组,经理人资本主义时期分散的股权集中到机构投资者手中。这一变化极大地改变了美国公司整体的治理结构和权力运作模式。“股东价值最大化”成为公司行为的最高准则,并被认为最有利于企业效益和社会福利最大化。尤其是在金融资本全球化背景下,这种“股东导向型”的“现代”美式公司治理制度得以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并被广泛采用。然而经验数据表明,这种被誉为“最佳”“高效”的公司治理模式带来了更多的非正式就业、不稳定的劳动关系模式和企业内部日渐扩大的薪资鸿沟。此种公司治理模式在中国企业的实效以及对企业治理能力、就业和劳动关系的深层影响也需要来自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综合的考察与回应。

四是金融化如何影响社会分层和收入、财富不平等。经济金融化对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金融部门在经济活动中地位的上升和金融部门开放力度的加大首先将直接有利于金融从业人员在社会收入分配中占据更多份额;其次,金融市场推动的公司高管薪酬体系变革(如公司高管收入中包含更多期权、股权收入,整体收入越来越高等)将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的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最后,个人和家庭金融资产的多寡不但影响个人和家庭的收入,也会对长期国民收入分配和国家整体财富不平等产生影响。此外,若金融部门的资金持续经过土地——土地开发——房地产业等财富积累链条流向投机产业,将拉大社会贫富差距,并导致金融泡沫的产生。当前,中国金融业内部改革和对外开放力度进一步加大,金融对社会分层和财富分配将产生更深远、复杂的影响,值得学界密切关注。

五是金融化对家庭和个人生活的影响。随着金融化的扩张,金融理念和投资文化的作用范围已超出企业和市场领域,进入到个人日常生活实践和社会关系中,人们更加积极地运用金融理念与投资组合思维来管理资产、扩大消费信贷并介入金融市场,甚至于爱情、婚姻、子女教育都可以证券化或作为保险标的物进行投资(例如“恋爱保险”“教育保险”“学生贷款证券化”等)。当金融化深入到个人和家庭活动中,金融对人类的婚姻家庭制度、亲子关系、育儿养老、社会关系、人际互动、社会伦理等会产生何种影响亟待更多深入具体的社会学分析。

六是金融化如何影响科技创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金融化相伴随的另一重要趋势是“科技化”,科技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愈发重要并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两者互相影响并日益交融,出现了“金融科技化”和“科技金融化”的趋势。一方面,科技创新极大推动了金融创新、提升了金融化水平、规模和深度,另一方面,金融也全面融入科技创新的整个周期和流程,科技创新深受金融体系影响。从初创型科技公司成长为“独角兽”一般要经历数轮外部融资,随着中国科技发展、平台公司、投资公司的兴起和金融体系的开放,金融市场对推动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愈发关键。而以往的研究多强调市场机制、自由主义企业家精神与民间投资的作用,却忽视了科技创新中政府公共投资和宏观金融制度的重要地位(李国武,2020)。当然,金融对科技创新也不全是正面影响,金融资本对短期投资利益最大化的追逐使得大型企业很难进行长周期的战略研发投入,同时,在资本市场中要吸引投资,创业者和企业高管“编故事、讲故事”的能力很重要,由此制造了很多创业神话,引发了不少投资骗局,对资本市场和科技创新都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如何充分发挥金融在推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特别是解决我国“卡脖子”技术难题,同时抑制金融化对科技创新的不良影响,有待研究者全面深入分析,也需要政策制定者着重考量。

七是新金融业态如何影响金融风险防控和社会稳定。近年来,金融与信息技术的结合愈加紧密复杂,并诞生了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等多种金融新业态。由于金融体系和监管系统中制度更新的滞后(包括有效制度供给不足、制度间衔接不畅、制度作用范围有限等问题)、资本无序逐利的

“一哄而上”、超前于社会关系调整的新技术运用以及我国政治经济情境下政府与市场主体的较高关联性、民众对政府的无限责任期待(向静林,2016)等,新金融业态的风险扩散链条长、路径复杂且可能在特定的情境下促使金融风险向政治社会风险转化,积累社会不稳定因素。防范金融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的重要内容之一,不仅关系到财政稳定和宏观经济发展,还贯穿于人民财产安全、投资收入和住房保障等民生建设和社会治理过程中。对学界而言,一方面应深入分析金融风险背后的制度和社会根源,另一方面则须更加系统地挖掘和揭示互联网金融灾民、长租公寓爆雷(住房金融化)等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金融业态背后金融与社会、经济理性与社会责任、金融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复杂关系。

八是金融的社会干预机制。金融化程度加深使得金融系统在利益分配、资源配置和财富转移中占据更强有力的主导地位,与其所处政治社会结构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也更为复杂(刘长喜,2020)。在当前的国际货币等级体系和世界资本市场条件下,不但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国际金融地位趋于弱化,金融化也加大了发达国家国内政治稳定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压力(王福兴,2021)。2020年年底以来,中央层面数次强调加大反垄断力度、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并将其写入我国《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意在通过宏观的政策干预为金融发展指明正确方向、划定合理范围,对诱导过度承担家庭与个人债务、不正当竞争、不合规经营等行为从严监管,引导金融在服务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和为人民构建美好生活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近些年在实务界兴起的金融社会工作围绕提升金融素养、提高金融福祉的目标对青年、农民、老人等部分金融脆弱群体进行金融赋能干预服务(林典,2019;周晓春等,2019;李国武和方舒,2020),也为学界提供了研究金融社会干预机制的微观过程。特别是当前部分网络平台(金融)企业运用前沿技术工具和复杂包装模式深度参与到金融交易中,被资本俘获用来作为识别不同收入投资群体的工具,给中低收入或年轻消费、投资人群提供有偏向性的诱导,给缺乏金融知识和金融能力的家庭和个人带来过度财产和心理压力,也可能加速不同收入群体分化和固化社会不平等。正因如此,增强学界在金融发展中对社会干预机制的探讨,有助于推动形成兼顾金融发展与社会安全、金融赋能与民生福祉、从宏观到微观的多层次金融监管政策框架。

九是如何发展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金融在西方的崛起是资本日益全球流动形成巨量财富积累的过程,也是一部金融投机化、金融精英化、收入与财富不平等加剧的社会结构转型史。在西方资本主义框架下,金融市场主导国际国内的资本流动、产业布局和劳动力再生产,但并非以服务实体经济部门发展为目标,而是凭借在全球范围内对劳动力成本、税收的“探底竞争”(racing to the bottom)和瞄准短期股票收益的常态化“拆分兼并”等手段谋取利益最大化,这加速了金融“脱实向虚”的进程。但对金融强大资源融通能力和社会变迁形塑力量的运用并非只有西方新自由主义金融体系一条路可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结合国情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金融体制,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如何更好地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普惠性金融体系,避免西方资本主义金融的精英化及对社会的贫富分化和撕裂效应,如何保障弱势群体及中小微企业的金融需求,为服务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加快共同富裕提供便捷可及、负责任金融资源是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难以绕开的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如果说工业资本主义引发的第一次政治经济大转型的核心问题是“现代社会从哪里来”,那么,金融资本主义引发的问题则是“全球社会向何处去”。与“现代社会从哪里来”的回溯式探讨不同,“全球社会向何处去”这一设问是面向未来全球经济社会变革的方向性问题。目前,即便是一些研究金融化现象很多年的西方顶级学者,也很难就金融资本主义的未来及如何制约金融化带来的负面政治、社会影响等问题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尤其是在金融资本加快全球扩张,而部分国家保守主义和极端

民族主义势力抬头的情况下 推动基于全球统一行动的金融治理框架改革变得越来越充满挑战 经济(金融)理性、社会自由和政治诉求之间的关系更趋复杂。这也说明 学界若要在理论上回答“全球社会向何处去”确实需要包括金融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在内的更为综合多元的多学科视角。

总的来看 金融现象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也是十分重要的政治、社会、文化议题。金融无法不受社会情境和历史传统的影响 金融行动和制度中就体现有社会学家传统研究的取向和变量(Cetina and Preda 2012) 也不断加入时代发展前沿中经济活动与社会结构关系的最新变革因素。因而 社会学可以在解释现代经济和金融的核心问题上有所贡献 相信金融现象未来会得到中国社会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① 在扩展社会学传统研究领域的时候 也加强与金融学、经济学等学科在金融研究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共同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繁荣。

参考文献

- 艾云、向静林(2021):《从经济金融化到社会金融化——社会学金融化研究的兴起与展望》,《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第1期。
- 波兰尼,卡尔(2017):《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陈甌(2011):《超越嵌入性范式:金融社会学的起源、发展和新议题》,《社会》,第5期。
- 陈甌(2014):《理解民间金融的视角转换:从经济学反思到金融社会学》,《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期。
- 陈介玄、邱泽奇、刘世定、司晓(2018):《金融和技术变迁给治理带来哪些挑战——陈介玄、邱泽奇、刘世定、司晓对话录》,《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第3期。
- 陈云松、严飞(2017):《网络舆情是否影响股市行情?基于新浪微博大数据的ARDL模型边限分析》,《社会》,第2期。
- 戴维斯、金孙泰(2018):《经济的金融化》,《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第5期。
- 弗雷格斯坦 尼尔(2008):《市场的结构:21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学》(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 高柏(2009):《金融秩序与国内经济社会》,《社会学研究》,第2期。
- 黄晓春(2009):《“金融海啸”与中国社会政策的转变》,《社会》,第1期。
- 胡滨、星焱(2021):《新发展格局下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战略思考》,《中国农村金融》,第5期。
- 林典(2019):《金融社会工作:缘起、内涵与实务》,《社会工作与管理》,第2期。
- 李国武(2020):《公司金融化、风险—收益配置与技术创新——美国经验的启示和反思》,《金融与社会》,第1辑。
- 李国武、方舒(2020):《社会工作视角的脆弱人群的金融安全网构建》,《社会工作》,第2期。
- 李培林(2001):《理性选择理论面临的挑战及其出路》,《社会学研究》,第6期。
- 梁光严(2021):《金融化:时代的关键词》,《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第1期。
- 刘长喜(2020):《金融化与“好的”金融社会建设》,《社会工作》,第2期。
- 刘长喜、桂勇、于沁(2020):《金融化与国家能力——一个社会学的分析框架》,《社会学研究》,第5期。
- 刘春荣(2009):《全球金融危机与国家自主性》,《社会》,第1期。
- 刘世定(2005):《低层政府干预下的软风险约束与“农村合作基金会”》,《社会学研究》,第5期。
- 饶育蕾、张轮(2005):《行为金融学(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 史晋川、孙福国、严谷军(1998):《浙江民营金融业的发展》,《浙江社会科学》,第5期。
- 盛思鑫(2010):《组织、工作与情感异化——一项对厦门保险代理人的调查》,《社会》,第2期。
- 斯梅尔瑟、斯威德伯格(2009):《经济社会学手册(第二版)》,华夏出版社。
- 孙立平(2009):《金融危机的逻辑及其社会后果》,《社会》,第2期。
- 汪丁丁(2010):《行为金融学基本问题》,《财经问题研究》,第7期。
- 王国伟(2012):《金融市场的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新议题》,《江淮论坛》,第1期。
- 王福兴(2021):《金融化与发展——国外学者论发展中国家的依赖性金融化》,《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第1期。
- 王水雄(2014):《中国金融市场化层级性与边界性——着眼于中小企业融资担保的一项探讨》,《社会学评论》,第2期。

^① 近年来,各大社会学学术期刊收到的关于金融社会学、财政社会学的文章越来越多,并组织发表了相关的专题研究文章,如《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4期的“财政与金融社会学”研究专题,《社会发展研究》2020年第4期的“财政社会学”专题研究,《社会学评论》2021年第1期的“金融社会学”专题。这在以前是鲜见的东西,可能就是某种趋势的体现。

- 吴晓求(2014):《金融理论的发展及其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4期。
- 吴肃然、谭晟宇、蔡华谦(2021):《加密货币热潮中的故事与观念》,《社会学评论》第1期。
- 向静林、邱泽奇、张翔(2019):《风险分担规则何以不确定——地方金融治理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研究》第3期。
- 向静林(2016):《市场纠纷与政府介入——一个风险转化的解释框架》,《社会学研究》第3期。
- 向静林、张翔(2014):《创新型公共物品生产与组织形式选择——以温州民间借贷服务中心为例》,《社会学研究》第5期。
- 杨典(2018):《金融全球化与“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的跨国传播:对中国公司治理改革的社会学分析》,《社会》第2期。
- 杨典、欧阳璇宇(2018):《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及其影响——对资本主义新形态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12期。
- 杨义凤(2012):《韦伯关于证券交易的论述与当代金融社会学的研究议题》,《兰州学刊》第10期。
- 尤辛 迈克尔(1999):《投资商资本主义——一个颠覆经理职位的时代》(中译本)海南出版社。
- 翟本瑞(2014):《全球化的转型与挑战:金融社会学的考察》,《社会发展研究》第1期。
- 张海东、李在烈(2009):《20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对韩国社会的影响》,《社会》第1期。
- 张杰(2011):《制度金融理论的新发展:文献述评》,《经济研究》第3期。
- 张圣平、熊德华、张峥、刘力(2003):《现代经典金融学的困境与行为金融学的崛起》,《金融研究》第4期。
- 张翔(2006):《合会的信息汇聚机制——来自温州和台州等地区的初步证据》,《社会学研究》第4期。
- 张翔(2010):《以政府信用为信号——改革后温州地区民营存款类金融机构的信息机制》,《社会学研究》第6期。
- 张晓晶(2021):《宏观杠杆率与跨周期调节》,《中国金融》第5期。
- 周长城、殷燕敏(1999):《金融市场的社会学视野》,《社会学研究》第6期。
- 周晓春、邹宇春、黄进(2019):《青年的金融风险、金融能力和社会工作干预》,《青年研究》第3期。
- Baker, W. (1984):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 National Securities Marke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9, 775-811.
- Brealey, R., S. Myers and A. Marcus (2001): *Fundamentals of Corporate Finance (Third Edition)*, McGraw-Hill Irwin.
- Carruthers, B. and J. Kim (2011): “The Sociology of Financ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7, 239-259.
- Cetina, K. and A. Preda (2005): *The Sociology of Financial Marke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etina, K. and A. Preda (2012):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Fina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avis, A. and K. Williams (2017): “Introduction: Elites and Power after Financialization”,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34, 3-26.
- Davis, G., K. Diekmann and C. Tinsley (1994):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Conglomerate Firm in the 1980s: The De-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n Organizational For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9, 547-570.
- Davis G. and S. Kim (2015):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Econom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1, 203-221.
- Davis G. and T. Thompson (1994): “A Social Movement Perspective on Corporate Control”,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9, 141-173.
- Epstein, G. (ed.) (2005): *Financialization and the World Economy*,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 Fama, E. (1970): “Efficient Capital Markets: A Review of Theory and Empirical Work”, *Journal of Finance*, 25, 383-417.
- Fligstein, N. (1990):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rporate Control*,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Fligstein, N. (2016): “The Rich Get Richer: The Effect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on Inequali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 Fligstein, N. and A. Goldstein (2015): “The Emergence of a Finance Culture in American Households, 1989-2007”, *Socio-Economic Review*, 13, 1-27.
- Pacewicz J. (2012): “Tax Increment Financ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fessionals and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Urban Politics”, *Socio-Economic Review*, 11, 413-440.
- Preda, A. (2007): “The Sociological Approach to Financial Markets”,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21, 506-533.
- Stearn, L. (1986): “Capital Market Effects on External Control of Corporations”, *Theory and Society*, 15, 47-75.
- Swedberg, R. (2000): “The Role of the Market in Max Weber’s Work”, *Theory and Society*, 29, 373-384.
- Van der Zwan, N. (2014): “Making Sense of Financialization”, *Socio-Economic Review*, 12, 99-129.
- Weber, M. (2000): “Commerce on the Stock and Commodity Exchanges”, *Theory and Society*, 29, 339-371.
- Weber, R. (2010): “Selling City Futures: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Urban Redevelopment Policy”, *Economic Geography*, 86, 251-274.

(责任编辑:周莉萍)

Financial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Major Topics

YANG Dian OUYANG Xuanyu

(Institute of Soc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School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 financial phenomena (the sociology of finance) has become a rapidly developing field since the 1980s, which reflect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deepening financialization and rising financial capitalism in Western capitalist countries since the 1980s. The influence of financialization is not limited to the economic field, but a process of full-scale expansion to politics,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which leads to the trend of financialization in the entire social life, shaping the research topics and orienta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providing a strong empirical foundation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rise of the sociology of finance. This paper traces and analyzes the empirical foundation and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sociology of finance, sorts out and summarizes the achievements and progress of sociology of finance accumulated in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and proposes key directions and major topics that need to be further studied in the future based on China's unique financial system and rich financial practices.

Keywords: Financialization; Financial capitalism; Sociology of finance

JEL Codes: A12; A14; Z13

Antitrust in the Field of Platform Economy: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Critical Issues

DU Chuang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mbines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platform economics (the theory of multi-sided markets) and China's practice to analyze some antitrust hotspots and in-depth issues in the field of platform economy in China.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 for the analysis of hot issues such as unfair price competition, below-cost sales, exclusivity, price discrimination, and data compatibility, it is not sufficient to simply apply ordinary product market economics, and the analysis must be based on platform's cross-side network externalities. Otherwise wrong judgments may be drawn. Second, the fundamental status of competition policy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as China steps into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Platform companie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hina's microeconomic structure, and antitrust issues in the platform economy are unavoidable. The importance of platform economy in lead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needs to be traded off against efficiency losses caused by monopolistic platforms. We suggest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the conflicts between platforms' cross-industry behaviors and existing regulatory systems based on individual